

浅析先秦时期渝西长江沿岸地区的历史和族源演变

张亮

江津博物馆 重庆 402260

【摘要】结合近年渝西地区，特别是长江沿岸考古调查的最新发现，对先秦时期渝西地区的文化发展和民族问题进行研究，提出对该区域的历史和民族发展的初步认识。

【关键词】渝西长江沿岸地区；历史；民族；演变

【DOI】10.12252/j.issn.2096-627X.2021.12.760

新石器时代后，人类社会开始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其后进入青铜时代，标志着人类进入文明高度发展的阶段，在历史上，我们将旧石器时代到战国时代，整个秦朝建立之前的历史时代称为先秦时代。这一时代，是人类社会突破复杂酋邦，向早期国家迈进的时期，向城邦化发展的文化突进时期。重庆渝西地区多为平坝和丘陵，土地肥沃，气候四季分明，非常适宜人类生存。渝西地区有长江、嘉陵江、涪江从境内流过，是重庆地区城邦产生历史较为久远的地区，是重庆直辖前的“江八县”（原四川省江津专区，包括江津、永川、合川、潼南、铜梁、大足、荣昌、璧山、綦江、潼南等县）区域，现有的考古资料证明该区域文化发源沿着长江和嘉陵江流域进行发展。20世纪50年代，江津长江北岸巴县冬笋坝船棺墓的发现，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巴文化的面貌，提出了巴文化概念。但由于该区域长江沿岸地区有关的历史文献和考古工作地欠缺，其先秦早期的历史研究较为薄弱，近年，随着考古调查工作特别是江津地区商周遗址的调查发掘，对该区域的早期历史文化有了初步的认识。

一、重庆地区先秦时期的文化发展

据《史记》记载，大约在公元前2070年的时候，中原地区的“姒姓”部落在各族战争中逐步强大，逐步建立了夏王朝，开始了中国王朝的世袭制，目前考古发现的洛阳二里头遗址极有可能即是夏朝的都城所在。而在同一时期的四川盆地，传说蜀山氏是古蜀人的祖先，先后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位君王，目前考古发现的宝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早期大概对应的是蚕丛时期，三星堆文化中后期大概对应的是鱼凫时期，十二桥文化大概对应的是杜宇时期，经考证三星堆文化初创年代约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时期，稍晚于中原夏王朝的建立。而巴文化在这一时期还未完全进入重庆地区，从重庆地区的考古实物来看，至少在杜宇时期前，重庆地区的出土器物更多的表现出了十二桥文化乃至三星堆文化特征的影响。到了春秋和战国时期，巴人的活动重心逐渐迁移到川东、重庆一带，巴国开始建立，《华阳国志·巴志》说：“及七国称王，巴亦称王”；“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江州即现在的重庆。20世纪末的三峡考古大抢救，使峡江地区众多的考古学文化面貌被揭示出来，代表性遗址有丰都石地坝遗址、忠县瓦渣地遗址等，这一时期重庆商周遗址的本土文化特征开始逐渐浓郁，典型器物有鼓肩小平底罐、尖底

盏、尖底杯、“8”形捏瓣纽器盖、高领圆肩罐、船形杯、圆底釜、侈口圆底罐等。根据这些考古资料，我们大致对巴蜀地区的历史演变进行梳理：“原始社会时期，巴蜀地区以氏族部落为主形成当地土著文化，随着生产力提高和与周边文化的交流，以四川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土著文化在吸收中原夏文化以及吴越文化、滇越文化等逐步形成自己的文化特点，开始辐射和影响巴蜀乃至陕南等地区，与此同时，汉水、清江流域的巴文化也逐步进入巴蜀，既进行融合也各自独立，逐步形成巴蜀2大文化区域”^[1]。

二、渝西长江沿岸地区的商周遗址

较为典型的为油溪大土遗址和荔枝下坝遗址，大土遗址位于重庆市江津区油溪镇金刚社区长江左岸的一级阶地上，目前仅开展了小面积试掘，主要出土器物有陶器和少量石器，陶器无出土完整器皿，均为残片，经过修复和研究，确定的陶器器型主要有小平底罐、绳纹罐、壶、豆形器、尖底杯、盆、钵、器盖纽等，另有较多器口沿、器底、器足等附件。陶器分为泥质陶和夹砂陶两种，夹砂陶数量略多于泥质陶，夹砂陶以灰陶和褐陶为主，其次为黑皮陶、黄褐陶，另外还有少量红褐陶、黑陶和磨光陶。陶片多为素面，纹饰以绳纹为主，另还有少量的凹弦纹、刻划纹、交错绳纹、桔皮纹，方格纹、麦穗纹、瓦棱纹等，器物间存在形制的变化，如高领壶的颈部越来越长，喇叭形器座由斜直变为外撇。由于该遗址出土的资料偏少，并不足以代表说明该遗址和本地区的文化状况，在没有新的资料前，我们暂且以管窥天，以蠡测海。该遗址的陶器不论从形制还是组合上，具有典型成都三星堆文化特点，例如出土豆形器、豆座、盖纽和盂足等器物。但基本不见巴文化遗址中代表性的尖底器，而以小平底罐和绳纹罐为大宗。纵观巴蜀目前的商周遗址，成都十二桥文化也有大量的小平底罐出土，而石地坝文化也有大量绳纹陶器。因此，大致判断大土遗址受到三星堆文化影响较为浓烈，但仍以巴文化为主，与丰都石地坝文化类式，同时有别于峡江地区，器物在形制上有一定的变化，加之由于江津地区处于的渝西地区为巴蜀结合地带，因而推测该地区的夏商时期文化特征，是巴蜀文化交汇，文化融合主要通道。

三、渝西地区先秦时期人类民族情况

江津县志载：“江津在蜀东，古巴国地”。因此，我们以巴人自称，但需要指出的是，从最为广泛的意义来说，巴作为地域名称，在此区域内的各个民族也被通称为巴。巴蜀

地区的民族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因为长时期处于民族交往、民族迁徙的状态，其文化及民族源流都呈现出一种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状态。而“巴文化”，由于巴蜀两地的文化特征类式，最早是和“蜀文化”混在一起的，称为“巴蜀文化”。巴蜀地区的族源问题扑朔迷离，李白在《蜀道难》中描述古蜀国：“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自古蜀的族属问题迷雾重重，历史文献上对其也是语焉不详，其族属有氐羌说、濮人说、巴人说、东夷说等。而巴人，目前也争议较多，主要有2种说法，“一种认为其最早活动在今鄂西、渝东一带的清江流域，其迁移路线为清江流域→湖北西部→重庆东部→汉水流域→四川东部→重庆一带。另一种认为巴人早期活动于汉水上游一带，甚至远至甘肃天水一带，后来逐步向南迁徙，其中一支最后来到清江流域落根”^[2]。渝西地区是巴地通往蜀国的主要通道，不管哪种说法，巴人迁移到达渝西地区应在较晚的时期。同时，渝西地区山谷相间，聚居点一般在河谷间的阶地或台地，这些阶地或台地面积均较小，相互间相距离较远，至到如今，分散型小聚落的生活状态仍然是本地区乡土民居的特点。因此，周代后巴建都重庆江州，由于上述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巴对该区域的领导模式也应该是一种部落联盟式状态，那么渝西地区在商代早期的民族是谁。著名史学家邓少琴先生认为：四川川东地区在巴人未迁入前，其古老居民当为濮人。濮人和氐羌、百越、三苗一起被称作我国古代四大族群，但是唯独濮人历久而来却又于今不见，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关于濮人的由来，有起源于东南、滇以及汉江平原等多种说法，但都认为巴濮是通过长江等江河迁移到巴蜀后形成的。濮人直系繁多，也称百濮，有学者认为今西南部分汉及少数民族的彝族、哈尼族、白族、土家族、布朗族、普米族、纳西族、拉祜族、氐族、羌族、傈僳族等民族都跟古濮人有关系。唐·张守节《史记正义》说濮在楚西南，即今重庆南部、四川南部、贵州、云南等地，又据零星的史料记载判读，濮人以夜郎和滇为大宗，但散居四川不少。至于重庆地区之濮，《华阳国志·巴志》载，先秦渝西地区有濮、賸、苴、獯、夷、蜒诸族，皆为百濮支系，其中渝水（嘉陵江）两岸的賸、苴、长江沿岸獯、夷为土著，蜒为江汉迁来的濮人一支，可见，“先秦时代渝西地区的濮人，应有商周时代即已在此定居，也有春秋时代在江汉地区迁移而来的濮人支系。它们名号各异，但在来源上同属百濮的不同分支，随着各地濮人经济、文化以及与他族的融合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民族集团。秦汉后史迹对这些民族集团或称为夷，或称蛮，或称僚”^[3]。

四、渝西地区的樊人之谜

樊人也为濮人的支系，根据《无和郡县志》载：“戎州，禹贡梁州之域，古樊国也”。《通典·州郡六》记：“戎州，故樊侯国。”樊人建国极早，大概范围在宜宾及云南东北部部份地域，时为巴蜀二国的邻国。秦灭巴蜀二国，置巴、蜀、汉中三郡，在地方设立郡县制，原樊国地域划归蜀郡管辖，置为樊道县。故一般认为樊人主要居于川南。但渝

西地区的江津綦河口又名樊溪口，綦江又名樊溪，那么渝西的江津和綦江以前是否也与樊有关系吗？根据近年对江津綦河流域的考古调查，特别是支坪荔枝下坝遗址的调查试掘，该遗址采集的标本主要有夹砂黑陶片、泥质红陶和灰陶，器表纹饰以粗绳纹为主，器类有花边圜底罐、尖底盏、网坠等，与峡江地区的商代晚期陶器一致，特别是花边圜底罐，过去主要在库区盐业遗址周边发现，认为其是人类早期制盐的工具，这件花边圜底罐是目前渝西地区首次发现，这些文物说明该区域在商代后期是巴文化的影响区域，而樊人的文化遗迹特别是早期樊人生活习性的研究较少，普遍认同的樊人悬棺遗址，也有学者认为：“樊道之樊人，没有这些习俗，樊人与都掌僚人，不是同一族类，把樊人冠于悬棺之上是不正确的”^[4]因此，目前尚无樊人在此生活居住的有力证据，但在綦江现多有僚人的遗迹，那么綦河流域早期是否有樊人居住，是樊人物资通道还是聚居地，是否后来沿綦河逐步进入黔北，在渝黔交界处得以发展，还需要通过考古发掘和历史研究乃进一步证明。同时，有学者认为，樊人即是濮人，2种名称其实是由于发音的问题，也有人认为先秦时期中原华夏诸族对其西南诸族统称为“樊（bó）”人。

综合以上，对渝西地区长江沿岸先秦时代的文化和族源问题进行总结：渝西长江沿岸地区早期人类族源应和整个蜀地的民族源头背景类式，生活着很多不同种族的部落，由于长江航道与湘楚相联，早期的濮人和较晚一点的巴人进入巴地后逐步到达该地区，与当地民族逐步融合，在多种文化的不断碰撞和融合下，渝西地区在商代早期受到了三星堆等蜀地文化的影响，后期在巴的统治下，以巴文化为主的本土文化开始显现，整体特征显现出其巴蜀文化主要交汇通道的特点。可以认为，渝西长江沿岸地区是四川、重庆这2个地区交流融合的缩影，是四川、重庆历史上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重要区域之一。从历史和文化根源的角度，巴蜀2地在族源和文化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关系。历史证明，如今国家提出的成渝经济圈的发展战略，是川渝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选择。

参考文献

- [1]白九江、李大地. 试论石地坝文化[M]//李禹阶主编. 三峡考古与多学科研究.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7: 83.
- [2]钟周铭 彭邦本. 巴人早期活动地域及其迁徙考[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总118期第25卷. 2017(6)
- [3]段渝. 卷一先秦[M]. 贾大泉、陈世松主编. 四川通史.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0: 430
- [4]刘复生. 古代“樊国”地区的樊人及其“消亡”[J]. 四川大学报. 2020(5)

作者简介:

张亮(1973-12), 男, 汉族, 重庆江津人, 江津区博物馆, 副研究员, 从事文博管理、考古及近现代建筑修缮等研究工作。